

“第二个结合”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三维逻辑

■ 刘怡婷

现代文明的礼敬之心，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之文明底气。

中国式现代化溯源于科学社会主义，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文明进步发展的姿态向世界展示了“第二个结合”的新景观。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构并非一蹴而就，也非陷于理论殿堂的自得其道。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表征。面临国内外形势的重要变化，人民之间与时代之间为中国式现代化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实现文化建构，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结合时代、理论、历史、情怀等要素，传达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之音，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以科学的态度用实践检验真理。

二、历史之维：在“第二个结合”中破新旧文明之澄明

“第二个结合”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返本开新的历史特性。在新旧文化区别层面，早在1919年的李大钊便提出社会主义者的宿命便是将理论应用到所处的环境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着眼于中华文明如何成就马克思主义发展，焦点在于马克思主义如何成为中国的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成则着眼于中华文明在马克思主义传入的环境下发展。二者的相輔相成使得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一种崭新文明主体的面貌出现，真正实现了扎根于木而溯流于源。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步深化了“第二个结合”，以大历史观的视野审视与警惕文化虚无主义。

“第二个结合”表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科学理性的价值导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进一步继承发展。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体系中，文明的出现、文明时代的到来均昭示着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同时，恩格斯认为，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会前进一步。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因为文明而产生的机构都会走向自身的反面，这也印证了文明的发展是在对抗中进步的。在无

产者与有产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中，文明社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作为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容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式现代化促生了中华文明的换代转型。

“第二个结合”显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开放包容的文化传承。科玄论战阐明了世界性争鸣于文明体系生成的重要性。以玄学派的张君勱的观点为例，一方面脱离西方现代性的方方框框，为中国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提供适当空间。另一方面，以“有益者采之，有害者革之”的态度对待西方文明，以评判之理看待中西之学。梁漱溟、熊十力在思想层面上即使偏向于文化守成主义，但也对中西互动的世界新学不无倡导。在二人的观点体系中，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明的调和将为世界未来新文明植根播种，实现人人以善道相与、各足于分愿的愿望。当代哲学家萧蓬父也曾直言认为通过西方文明的结构与重构，广泛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从中西文明的交流交往中孕育出世界文明之新胚胎。“第二个结合”体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人为本的鲜明特质。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同，以资本逻辑为宰制的西方文明使得一切生产力沦为资本的附庸，尤其是在科技高速发展的21世纪，资本与科技的共谋诞生了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生产力在发展的同时，周期性危机的破坏无法避免进而瓦解其本身，昭示了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出自《易经》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民生理念到以“仁”为旨归的共同体优先原则实现了对以往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凸显了其伦理、情感、价值与理性、事实、逻辑的耦合互嵌。

三、未来之维：在“第二个结合”中达中外之兼济

“第二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发展，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广阔纵深历史叙事。基于依附论视角下的西方中心论是以“中心—边缘”体系作为行为规则而维系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统治的，西方中心论的解构与溃败，首要的便是对利器

语体系。在“真理道义”“人权民主”“普惠共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全人类共同价值”等词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便是最具基石与总体意义，坚持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统一性、和平性的有机统一，宣告了西方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了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和解。在中国式现代化基础形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念既非西方启蒙时期提倡的抽象人性优越论，也非古老的朴素自然中心论，而是强调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恶果。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的实现为旨归，而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是追求物的价值形式的活动，始终以资本的形式完成生产与再生产活动，自然也在此过程中被掠夺与再掠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于资本主义无休止地奴役自然的扬弃，是通过劳动确认人的“类存在”的肯定与作为人类有机体的自然的尊重。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资本主义文明伟大的自由平等理念之下，隐藏着劳资之间的不平等和劳动者在雇佣劳动制度下的不自由。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导致了道德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二元论，消解了传统伦理学中的善和公正生活。道德领域的善并不一定就是公正的，只因它被贴上“绝对服从”的标签；经济领域的公正也不一定是善的，因为它常常被视为是与道德领域毫无干系的权宜之策。当政治领域只追求公正，而不兼善，当道德也不再追求善，而只追求公正之际，资产阶级统治者便只会做出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决策，而不再对于是否符合人性之善做出追问。道德也与现实社会相脱节，成为形而上学的浮木。而道德意识与阶级关系的关系构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张力性内涵，原原本本文明的道德意识幻象转化为实在的、具体的社会关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仅是革新的生产方式层面的经济新形态，更是革新的理想生活方式意义上的精神新形态，是融合已然王国物质元素与自由王国精神元素的“现实运动”，能够在必然王国的此岸与自由王国彼岸的张力中能够给现代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社会带来道德

的希望的新文明。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谱系中，人们拥有了充分自由的时间进行劳动创造，都能够按照“美的规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开展畜牧，晚饭后进行批判。”通过重建物质生产方式进而重构精神生活的生活之本，从而在后资本主义文明的时代勾勒出物质与感性相统一图景。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对全人类共同福祉的深切关怀表达了全新的人文精神。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现代”在于对富裕的物质生活、充实的精神环境、协调发展的自然生态、发达的科学技术不同的协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同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不同的，是它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消除了阶级之间的对抗性，实现了个体进步与社会整体进步的辩证统一，扬弃了人的异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破除资本主义文明下的利己主义共同体的过程中，共情世界各民族的命运，以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为考量，彰显出博大宽厚的历史胸怀。

交换价值框架下的资本主义以资本逻辑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其生产方式所蕴含的矛盾必然性使人们陷入了文明异化的窠臼。紧张、冲突、暴力遍布于社会生活中，将现代社会的道德悖论推至极致，构成了一幅冲突与博弈、良知与公正并存的图景。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赤字”“信任赤字”“管理赤字”等现象屡见不鲜，自恃文明的资本帝国在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的态度并不如意料中积极发挥正向作用。占据文明制高点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宣告了文明冲突论的终结与文明终结的高警，是一种超越串联文明的并联文明，实现了最先进、最健康的文明革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并非是对传统文化的照搬复刻抑或是对外来文化的全盘吸收，而是在古今、中西的融合中赋予全新文化生命体以活力的。在“历史终结论”“西方中心论”“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全球化场域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于危机中孕育新机，在挑战中创造机遇，在坚守自身立场的基础上汲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并加以创新，使中华文化勇立在世界潮流。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2024年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生专项课题：数字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形有感有效传播的挑战及应对研究（项目编号：GTTX2024041）。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现状与提优路径研究

——以H市为例

■ 毛昱皓

红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革命历程，是激励后人砥砺前行的重要力量。H市作为历史悠久的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不仅是当地独特的历史记忆，更是推动地方文化繁荣、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开发与利用这些红色文化资源，使其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同时，也能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贡献力量，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红色文化资源概述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概念及其价值

1. 红色文化资源的内涵

红色文化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造并积累下来的宝贵财富。它涵盖了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既包括革命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重要旧址、遗址、遗迹、遗址、纪念馆或场所等实物资源，也包含革命历史、英烈事迹、革命精神、红色文艺作品等非物质资源。这些资源共同构成了红色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承载了深厚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

红色文化资源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们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精神的传承。首先，红色文化资源具有深刻的历史教育价值，它们通过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生动的英雄事迹，让后人铭记历史、不忘初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其次，红色文化资源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它们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文化内涵，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二）地方红色文化资源

1.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定义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是指特定地域内，在革命历史时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建设实践及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重要历史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总和。这些资源包括但不限于革命遗址、纪念馆、烈士陵园、纪念碑、革命文物、红色故事、革命精神以及相关的红色文艺作品等，它们不仅是当地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连接过去与现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

2.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类型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多样，涵盖革命遗址遗迹、纪念馆博物馆及烈士陵园纪念碑等多元类型。革命遗址遗迹作为历史的见证，承载着厚重的记忆，让后人得以缅怀先烈、汲取革命精神。纪念馆与博物馆则成为展示红色文化的璀璨窗口，通过精心策划的展览，让参观者直观感受革命先烈的英勇与崇高。而烈士陵园与纪念碑，作为纪念与教育的圣地，不仅安息着无数革命英雄，更铭刻着他们不朽的功勋，激励着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这些资源共同构筑了地方红色文化的深厚底蕴，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二、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现状

（一）保护现状

当前，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随着社会各界对红色文化价值的认识不断提升，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加大了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通过立法保护、修缮维护、环境整治等措施，有效改善了红色文化资源的保存状况。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环境的影响，部分红色文化资源仍面临着损毁、消失的风险，如革命遗址遗迹的侵蚀、文物的流失等问题依然存在。

（二）开发利用模式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模式日益多样化，旨在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

双重提升。一方面，许多地区采取“红色旅游+”的模式，将红色文化资源与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文化教育等相结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旅游线路和产品，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学习，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三）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还产生了深远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方面，红色旅游业的蓬勃发展直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带动了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同时，红色文化产品的开发与销售也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丰富了地方产业结构。社会效益方面，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增强了民众对革命历史的认知与尊重，激发了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三、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当前面临的挑战

（一）红色文化资源的理解定位还有一定局限性

当前，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对于红色文化资源的理解定位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部分地区过于注重其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其作为革命历史遗产和民族精神象征的深刻内涵，导致在开发过程中出现了商业化、娱乐化倾向，削弱了红色文化的严肃性和教育意义。同时，对红色文化资源的挖掘和阐释不够深入，缺乏创新和特色，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多元化的文化需求，影响了其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红色资源产品开发方式简单化，没有创意

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一个显著的问题是产品开发方式过于简单化，缺乏足够的创意与创新。当前市场上的红色资源产品大多停留在初级阶段，如简单的图文书籍、纪念品、旅游线路等，这些产品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传递红色文化的信息，但形式单一、内容雷同，难以激发消费者的兴趣和购买欲望。

（三）对民族地区经济带动作用较小

尽管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和历史价值，但在实际开发利用过程中，其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带动作用仍然有限。这主要是由于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多集中在特定区域或景点，未能有效辐射和带动周边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部分民族地区受限于基础设施、交通条件、人才资源等因素，难以充分参与到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中来，进一步限制了其

对地方经济

的贡献。

（四）场馆管理体系不完善

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中，场馆作为重要载体，其管理体系的不完善成为制约因素之一。部分场馆存在管理松散、责任不明、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导致游客体验不佳，影响了红色文化的传播效果。同时，场馆的运营与管理缺乏科学规划和长效机制，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地方红色文化资源面临挑战的原因

（一）认知与定位不足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面临挑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知与定位的不足。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认识不足，仅将其视为普通的历史文化遗产，未能充分认识到其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导致在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过程中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投入。

（二）产品开发与创新滞后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面临产品开发与创新滞后的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产品形式单一、内容雷同、缺乏创新和差异化。传统的图文展示、纪念品销售难以满足现代游客的

多元化需求，而新颖、富有创意的产品开发却未能跟上步伐。这种滞后不仅限制了红色文化资源的市场吸引力，也影响了其传播效果和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升。

（三）经济带动效应有限

尽管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但其实际带动效应却相对有限。这主要是因为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往往局限于特定区域或景点，未能有效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部分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缺乏科学规划和长远眼光，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难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此外，红色文化资源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度不够，也限制了其经济带动效应的发挥。

（四）管理体系与机制不健全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管理体系与机制不健全是制约其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因素。目前，部分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管理存在多头管理、责任不清的问题，导致管理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同时，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和长效的保护机制，使得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难以持续进行。此外，管理人才的缺乏和专业技能的不足也制约了管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五、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提优路径

（一）坚持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理念

在提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过程中，首要任务是坚持正确的开发利用基本理念。这包括尊重历史、保护为先的原则，确保红色文化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不受损害。同时，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文化效益的协调统一，避免过度商业化开发。

（二）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提高红色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为了提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必须深入挖掘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整理和研究红色历史资料，提炼出具有时代价值和教育意义的红色故事、红色精神，以多种形式进行传播和弘扬。同时，加强与其它文化资源的融合创新，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文化品牌，提高红色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三）发展红色旅游，带动老区经济发展

红色旅游是提升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价值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可以带动老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和就业增长，促进当地经济的全面发展。在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时，要注重与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等相结合，打造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体系。同时，要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和旅游市场管理，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和

服务质量。

（四）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增强红色景区竞争力

从业人员是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力量。为了提高红色景区的竞争力和服务水平，必须注重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通过加强培训和教育，提升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服务技能和职业素养。同时，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考核机制，激发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通过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从业队伍，为红色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六、结论

针对H市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现状与提优路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H市在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认知不足、产品开发滞后、经济带动效应有限以及管理体系不完善等挑战。为进一步提升H市红色文化资源的价值，应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基本原则，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积极发展红色旅游，带动老区经济发展；并注重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增强红色景区的竞争力。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H市将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弘扬红色文化，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作者单位：宿迁学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 苑书聿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共七大总结的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出于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开展党内民主、纠正出现的各种错误、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遭受巨大挫折、面对极为复杂局面、极其凶险环境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如何排除内部和外部的错误因素的干扰，做出正确的选择，如何及时纠正错误的思想、行动，使得中国革命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进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显得极其重要。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促成“八七”会议中政治路线的转变

大革命遭受重大失败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过去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的错误。对于国共合作，毛泽东批评了在此过程中我们党一味地被动让步；关于土地革命，毛泽东批评了中央限制农民革命的错误，并反省了自己没有从一开始就坚持正确意见的思想状况；关于军事问题，他批评了以前党对于军事工作的疏忽，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此外，毛泽东严肃批评了过去陈独秀违背党内民主的做法，建议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取下级的意见。毛泽东的发言体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也为健全党内民主、建立党内正常的同志关系，保证党的决策正确做出了示范。不仅如此，其他许多与会代表也充分发言，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很多问题，并促使党的政治路线发生了根本转变，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二）古田会议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的奠定

古田会议对于党和红军的建设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进行了长篇发言，最后经过大会讨论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在思想建设方面，决议列举和批评了红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表现，提出了贯彻和加强党内教育的正确办法，并将党内思想教育问题列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决议》明确批评了非组织观念，强调要健全党的组织，增强党员的组织观念。《决议》不仅强调了红军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良好作风的重要性，而且教育党员要明白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的战斗力以领导革命的最后胜利，不应当在批评中掺杂个人的私利观念。关于开展批评的场合，要求要在党内批评，不要在党外去批评，同时要做到“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实事求是”。会后，红四军各级党组织都按照会议决议对照检查了各自存在的问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古田会议所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践及其确立的相关理论原则，使得我们党真正熟练掌握并有效运用这一有力武器，为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遵义会议上思想上的激烈交锋

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举行。会议首先由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他把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被迫退出苏区的原因归结为自己及双方力量悬殊的客观因素，为临时中央和自己错误的辩解。接着，由周恩来作报告，他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失败的责任。在张闻天报告之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博古的观点，指出博古和李德奉行单纯防御战略，即消极防御战略的主观错误是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根本原因。毛泽东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王稼祥在严厉批判李德和博古在军事上的错误以后，旗帜鲜明地提议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会议及会后作出三项重要决定，其中包括选举毛泽东为常委，取消原先由博古等人组成的“三人团”，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以及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实际确立，为长征最后胜利提供了正确的组织保证。

进行彻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会议期间，尽管周恩来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负任何责任，但是，他却出于团结的目的，勇于自我批评、承担责任，这就作出了表率。对于博古和李德的错误，与会绝大多数同志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遵义会议还开了正

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先河，一改以前党内普遍存在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对博古、李德等人既进行了严厉批评，又对他们进行真诚的团结和教育，使他们以后在重要岗位上继续发挥自己的作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除了上述典型的事例，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六大、六届三中全会和瓦窑堡会议等场合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经验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以党的利益为准绳。陈独秀是党的杰出创始人，对于党的创立、对于党建立初期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由于在大革命时期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因此，在“八七”会议上，本着对党和革命前途负责的精神，与会代表对于他的错误还是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作出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大决策。这充分体现了与会人员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

第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基于事实，做到实事求是。博古、李德不了解中国国情，不能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一味地采取消极防御战略，结果使红军不能扬长避短，处于被动状态，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等人对于博古、李德的批评，正揭示了他们错误的本质，所以才获得大多数与会同志的赞同，即使博古本人最后也要心服口服。

第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要注意方式，要做到实事求是，评价全面。批评一些党员干部的缺点，要注意方式和态度，尽量使之能够接受。还有，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事求是，做到全面准确评价，既要指出其错误，也要肯定其优点，从而让被批评者易于接受，使之认识到对其开展批评是为了他本人的健康成长，也是为了党的总体进步。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为了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我们就要进行全面从严治党，进行党的自我革命，就要大力发扬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作风，这对于保证党员干部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保证党组织决策的正确性和及时纠正工作中出现的失误，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就要本着对党的事业和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红红脸”“出出汗”，以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不断清除党内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使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受到洗礼，灵魂受到触动”。

第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常态化。按照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规定，除了要在党的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场合提出和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外，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如果发现党员干部的言论和行为有不恰当的地方，也应该立即指出。对这种情况，任何党员都有责任、有义务提出批评和建议。

第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要注重策略。进行批评要充分考虑到不同人的性格特点，尽量做到态度诚恳真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实事求是、出于公心、与人为善”，使得被批评的同志既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又不会有尊严被损害的感觉。被批评的同志也要虚心对待、认真反思，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带头示范，为广大党员群众作出表率。总之，我们党只有真正发挥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的作用，才能使我们不断纠正错误，保持正确，领导广大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基金项目：本文为滨州市2024年度全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课题（立项编号：2024XTN2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滨州市委党校（滨州行政学院）】